

新华社为苏南乡镇企业“鼓与呼”

“

时下，“乡村振兴”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回首征程，苏南人深深懂得，是被农民们深情称为“田野上的擎天柱”——乡镇企业为他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人们忘不了乡镇企业在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的辉煌篇章，更忘不了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立下的赫赫功勋。

也正是新华社记者，一开始就为之鼓与呼

本报特约撰稿袁养和

乡镇企业被责难，我们选择“鼓与呼”

苏南，是在改革开放中腾飞起来的。时下“乡村振兴”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回首征程，苏南人深深懂得，是举世瞩目的乡镇企业为他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在号称“乡镇企业王国”的江苏省，农民们深情地把乡镇企业称为“田野上的擎天柱”。人们忘不了乡镇企业在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的辉煌篇章，更忘不了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立下的赫赫功勋！

乡镇企业的出现，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但是，她在苏南的沃野上诞生之日起，就被极“左”路线打入“另册”，以后又在“以小挤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指责声中艰难地成长。相反，新华社一开始就把乡镇企业视为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事物，积极扶持。

1978年秋天，年近花甲的江苏分社社长程予亲自出马，带领分社的农村记者华惠毅、赵明和我，来到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无锡县，决心将这个县农、副、工综合发展的典型经验总结出来，推向全国。

无锡县不愧是“乡镇企业王国”桂冠上的一颗明珠，我们所到之处，有关乡镇企业创业的种种感人事迹扑面而来，俯拾即是。有的村盖不起厂房，就把厂办在破庙、古庵里；有的厂刚办时没有电焊机，工人们就趁大厂下班时去借，晚上抬过来，清晨送回去，整整抬了两年；有的厂为了节约开支，工人们宁可当纤夫，拖着沉重的货船跋涉数百里，硬是把产品运到目的地；有的厂长赴京聘请工程师，到达首都已是深夜，为了确保找到工程师本人，厂长竟睡在工程师门口堆放的大型水泥管里一直等到天亮……“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这是对乡镇企业艰苦创业精神的最好写照。

无锡县乡镇企业局的局长毛乃有告诉我们，无锡县的实践证明，单靠农业的积累，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只有发展乡镇企业，才能为农业提供高积累。多年来，无锡县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置农业机械的大量资金，90%以上来自乡镇企业的利润。无锡县之所以能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也主要得力于乡镇企业的发展。

从1978年11月3日到5日，我们在无锡县采写的一组稿子——《这条路非走不可》《不是倒退，而是前进》《启事》《秘诀》，由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每天以半版的篇幅刊登，同时还配发了编者按和评论文章。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一个万紫千红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春天来到了。读者们说，新华社的这一组报道，为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发展吹响了进军号。

袁养和

从19世纪60年代，我的高祖母定居湘北算起，已经过去了150年。

150年来，家族日渐壮大，也逐渐淡出原来居住的山谷。回望来路，牵引家族向前发展的，始终是一种不熄的信念和永恒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驱使一代又一代人为之风雨兼程、百折不回的原生动力，这种力量不仅溶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更存在于民族的基因深处。

胸中有烈火，抗争为正义

我的高祖母姓汪，她从南京辗转来到湖南，定居白鹤谷。

她早年在上海参加小刀会，从事反抗清廷的斗争，起义一度取得成功。然而，在清廷和洋人的联合绞杀下，小刀会的斗争最终失败。随后，她加入太平天国。

天京城破。她和溃败的太平军一起，四散流落。从南京到湖南一千多公里，一路颠沛流离。

白鹤谷深藏于湘江右岸，在湖南省城长沙和岳阳之间，其间群山起伏、层峦叠嶂，为她躲避官兵搜捕提供了天然屏障。

清末乱世，涌入白鹤谷避难的人越来越多，有流离失所的难民，也有政治上失意的官员。左宗棠、郭嵩焘等晚清名臣，就曾在白鹤谷修筑避暑山庄。她领养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名叫大喜。曾祖父八岁进山，与高祖母相依为命，依然保留原来的姓氏。

曾祖父为人憨厚，老实巴交，山里人不时刁难他。我的高祖母一双“三寸金莲”，武艺却不错。据说她三次显露武艺，刁难的人才开始收敛。

一次祠堂分谷，我的曾祖父去时，主事的人不肯发谷给他。我的高祖母听说以后，提着箩筐赶了过去，她踩着人们的肩膀，直接跃上二楼，装满一担稻谷，又拎着从楼上轻松跃下。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从此再没人敢欺负我的曾祖父。

三中全会前，一花引来百花香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成百上千个农副工综合发展的先进典型在苏南的大地上迅速崛起，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阴华西村。

早在乡镇企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备受打击的时候，华西村的老当家吴仁宝就已领着村民们在偏僻的小河边办起了一个小五金厂。为了保密，吴仁宝让人在工厂四周砌起高高的围墙，所有对外的窗口都挂上厚厚的窗帘；有关工厂的一切，对外守口如瓶；村上介绍致富的经验，一概只谈“以粮为纲”；上级来人视察，工厂马上停产，所有职工全部转移出去“大办农业”，开沟除草，挑泥积肥，干得热火朝天。待视察的领导满意地走了，职工们立即回厂，加班加点，把停产的损失补回来。这个被农民们戏称为“地下工厂”的小厂，在隐姓埋名的岁月里为华西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以后，华西又靠这个厂“下蛋”，办起了一系列工厂，到1978年，全村工副业项目已有30多个，产值占全村总值的78%。

农副工的综合发展使华西农民迅速富裕起来。当时有两名去华西采访的德国记者，跑到一户“富农分子”家里，提出一连串问题。当问到华西农民的收入情况时，这个“富农分子”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解放前，她家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年至多10担稻谷；现在，华西农民每人每年的分配收入再加上集体福利，相当于24担稻谷。这个“富农分子”心悦诚服地承认，如今华西农民的收入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富农！

华西村的事迹和经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三中全会前夕，由我与江阴县通讯员赵和兴一同采写的长篇通讯《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登上了人民日报头头条，全国所有的省报也以显著的版面刊登。这篇通讯详细报道了农副工综合发展给华西带来的巨大变化，抒写了富裕起来的华西农民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文中写道：“农民年年都在算账，正因为集体经济给社员们带来越来越美好的生活，他们的才能与旧制度离得更远，与社会主义新制度贴得更紧。”人民日报为这篇通讯配的专栏指出：“走农副工发展的道路，努力壮大集体经济，逐步改善社员的生活，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越走越宽广。”

一花引来百花香。华西村的经验震动了全国。到华西参观取经的风风起云涌，络绎不绝。人们从华西学到了发展乡镇企业的真经，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充满了信心。

“碧溪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苏乡镇企业的



▲这是1994年袁养和（左）陪穆青采访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时的合影。

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改革开放，为乡镇企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市场经济，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江苏乡镇企业凭借“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企业能死能活”的灵活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大显身手。1981年，江苏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在全国遥遥领先。到1984年，江苏乡镇企业又超过200亿元，在全省工业生产中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

1984年春节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江苏视察工作，对江苏乡镇企业作了高度评价。当他来到常熟县碧溪镇时，这个镇繁荣兴旺的乡镇企业，特别是他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经验，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

春节后不久，江苏分社接到总社下达的采访任务，便立即让我和另一名记者费强一起，冒着大雪赶到常熟碧溪镇。新年伊始，正是农家休闲生息，闭门团聚的时光。然而，我们在碧溪镇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晨，通往碧溪镇的几条宽阔的马路上，自行车的铃声响成一片；数以千计的雨伞高高低低、挤挤挨挨，犹如起伏的波涛，从四面八方向碧溪镇涌来。人们浩浩荡荡向镇上的布厂、羊毛衫厂、塑料厂、针织服装厂。街上的积雪和薄冰转眼间被潮水般的人流冲刷了，消融了。然而，不到半个钟头，喧嚣的马路重新归于平静，各工厂门口的车棚里却黑压压地挤满了自行车。这些冒雪上班的人都是本乡的农民。这里的干部告诉我们，这个镇吃商品粮的居民只有494人，而在镇上工作的人却有6000多个，其中有5000多人是在乡镇企业干活的农民。倘若这么多人全涌进城里去当工人，厂里就要盖几千套宿舍，还要配备一系列福利设施，而现在只要有5000辆自行车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发展小城镇的好处。它可以使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不要国家增添任何设施就办起城市的工业……

一周以后，我们的饱含激情的长篇通讯《碧

溪之路》发到了总社。2月26日，这篇6000多字的通讯由新华社加“编者按”播发。“编者按”指出，“亿万农民离土不离乡，到镇上做工、经商，从事服务业，这对我国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繁荣商品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碧溪农民走的路，成了全国各地农村共同的富裕之路。

穆青和吴仁宝

1984年到1994年，是江苏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十年。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四号文件，肯定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和地位，制定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极大鼓舞了乡镇企业的广大职工。1988年，江苏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全国率先突破千亿元大关。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江苏乡镇企业贯彻小平同志“江苏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的谈话精神，解放思想，再跨大步。乡镇企业在全省工业中的比重从1984年的“三分天下有其一”，到1990年的“半壁江山”，再到1994年的“三分天下有其二”，谱写了威武雄壮的“三部曲”。

江苏乡镇企业和农村改革的迅猛发展，吸引了无数中外记者。

1994年春天，七十岁高龄的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在他离休后，与他的老搭档冯健一起，来到了江苏。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亲眼看看苏南在乡镇企业发展后小城镇建设的崭新面貌。

汽车沿着宽阔的乡间公路前进。苏南农村崛起的小城镇是那样的密集，在两位老社长眼里简直像“葡萄串”！一路上，每隔几百米就是一个村庄，每隔几公里就是一个繁荣的集镇。此情



一个家族跨越 150 年的奋斗与梦想

1946年结婚以后，先后生育7个孩子。

我的祖父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常难兼顾家庭。她全力支持他的工作，革命年代担惊受怕，解放以后又百废待兴。她一边承担起妇女主任的工作，一边拉扯着一大家人。

上世纪60年代，我的祖父处境艰难。祖母坚强地支撑起了这个家，面对批斗刁难也毫不畏惧。虽然经历困难岁月，孩子们都健康长大了。她酷爱读书，90多岁时依然耳聪目明，不戴眼镜照样看书看报。她常说“黄金非宝书为宝”，在她眼里，读书是最荣耀的事情。

她希望子孙们都发奋学习。我的父亲那一辈受教育程度都很高，和她坚持送孩子读书是分不开的。最艰难的时候，她为给孩子们筹措学费，连家里的楼板都卖了。

她颇有生活的雅趣，喜欢观习书法、侍弄花草。她常摆上一个小方桌、几碟点心，泡上几杯茶，拉着孙儿们“饮茶作乐”。

她教给我们各种传奇故事，还有书本上学不到的诗文，其中一首古诗只有10个字，但正序和倒序诵读，却能变出28字的四言律诗来。她就像一株温馨的兰花，坚守着家族的文脉。

顺应改革开放，闯出一片天地

我的父亲习惯紧皱眉头，嘴角的一颗黑痣，隐现出他的火爆脾气。他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赶上集体建设的火热时期。

父亲从小脾气倔强，我的祖父怕他惹事，教孩子们拳术的时候，就有意避开他。可他学东西快，躲在楼上偷看，等大家学完了，他一招一式全打出来，我的祖父这才答应教他拳术。

他先在集体企业毛笔厂上班，之后去长沙教书。一次放假回家，偶遇我的祖父被人批斗，他只

此景，使穆青惊叹不已。“你看，我这里一支烟还没有抽完呢，汽车已穿过好几个集镇啦！”他屈指手里的香烟，又屈指车窗外的集镇，对坐在身旁的我说，说罢忍不住放怀大笑。我也不由得激动起来，笑着说：“这个细节太生动了，我们一定要写到文章里去！”他笑着连连点头。

在苏南采访的半个多月里，我们跑了武进、无锡、江阴、常熟、张家港、昆山、吴县等县市。宽阔的马路，纵横的电网，连片的厂房，喧嚣的市场，整齐的农家新楼，展现出小城镇特有的繁荣兴旺。

在华西村，穆青和吴仁宝，这两位互相心仪已久的老人终于见面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吴仁宝领着穆青一路参观，从村口广场、农民公园、金塔楼顶、农家别墅，一直到世界公园。他眉飞色舞，抑制不住满脸的兴奋和自豪。穆青则是路旁观，一路赞叹，眼睛里闪出惊奇和敬佩的光芒。“苏南农民的创造，太精彩了！”他说。

在采访中，我们获知，苏南乡镇企业四分之一的产值，农村五分之四的外贸出口额，都来自小城镇。全国百强镇中，苏南就占了45个。

一次，我们在一个小镇采访结束时正要上车，一群农民围了上来。当知道我们是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其中一位小伙子笑着大声说：“我们的经验嘛，就是三句话：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

“这话太好啦！”我们异口同声，拍手叫好。“瞧，咱们的稿子已经成功一半啦！”穆青也拍着手表。

以后我们就循着这三句话的思路深入采访。稿子写好后，题目就叫《苏南农村第三波》。在稿子的结尾，我们写了这样一段话：“苏南农村有一种说法：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这三句话生动地反映了苏南农村改革、建设的三次浪潮。这三造，是苏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个伟大创举。干部们说，没有造田，就不会有后来的造厂；不造厂、田造不好，也无力造城。造城，作为苏南农村改革的第三波，把造田、造厂提到一个新水平，它必将推动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进程，探索出一个中国式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新格局。”

弹指间，十多年过去了。到2013年，苏南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过了3.6万亿元，人均突破了10万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化率超过70%，所有的县(市)全部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行列，其中7个县(市)进入了前十名。今日的苏南，风光无限，前程似锦！

作者小传：袁养和，新华社

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江苏省无锡市人，1943年出

生。业余创作著有长篇小说4

部，中篇小说4部，散文和报告

文学50万字。

身从人群中将我的祖父接了回来。从此，他无心教书，就此辞职回乡。

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拂面，乡镇企业方兴未艾。我的父亲那一年24岁，创办了自己的木器厂。第一单生意拿到60把木沙发订单，一把椅子能净赚七八元钱。

创业艰难。我的母亲协助父亲拓展业务，出差经常找不到饭馆。洞庭湖区水质不好，煮饭的水都是黄色的。变幻莫测的天气还可能带来生命危险。

一天晚上，货船在巨浪冲击下失去平衡，将一船藤椅和人都倒进湖里。风浪太大，藤椅一时拽不过来。幸运的是，一位老者驾着一只小舢板过来，帮着把藤椅都打捞上来了。我的父亲感谢老者，还特意拜他为师。

短短几年间，父亲的藤椅生意拓展到整个湘北地区，每个月都要出一到两批货，每批发出上百把藤木椅。人们在农闲的时候，都愿意到父亲的木器厂来做工，男的做木匠，女的编藤椅。木器厂年利润上万元。凭借红火的藤木椅生意，他积累下可观的财富。他作为公社的第一个“万元户”，在公社的表彰大会上受到嘉奖。

他添置了白鹤谷第一台自行车、第一台录音机、第一台“天仙”牌电风扇……家里买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邻居们围坐在院子里，大家像看电影一样围坐在一起，那热情不亚于观看一个新的伟大发明。

父亲热情大方，他的开销覆盖整个家族，对兄弟姐妹们的资助毫不吝啬。为小孩子做衣服，都是把裁缝直接请到家里，侄子侄女们也人人有份。

父亲的木器厂红火了10年之久，直到我的祖父中风瘫痪，我的父亲为了照顾他，难以兼顾木器生意。后来，他投身地方的建设和公益事业，主持农网改造和水利工程，创办白鹤谷第一个敬老院，一直干到退休。

父亲现在60多岁了，依然热情似火。他干事创业敢闯敢干、处公务刚正不阿，像高山上一棵青松，撑起一片天空。